



论石器时代的食物与宴饮对文明演进的推动*

薛小林 焦建平

摘要: 旧石器时代晚期人工用火遗迹大规模出现,人类较为稳定地食用熟食,火塘成为原始人生存空间的中心。熟食有助于人类的大脑发育与体质进化,火塘成为石器时代人类的交流空间,促进了人类语言能力提升、群体凝聚力增强和自我意识萌发,助推了人类文明的第一次演进。进入新石器时代,大多数聚落修建了宏大精良的大房子,用作部落举行公共集会与宗教仪式的场所。陶器、酿酒与烹饪技艺的发展以及大房子的修建,促成历史上最早宴会的诞生,部落首领利用大房子酿酒并举行宴会,实现了地位和权威的提升。与军事暴力不同,宴会竞逐权威的方式,在文明进程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持续推动人类文明的演进。从火塘到大房子的演变,是食物与宴饮对中国早期文明发生影响的历程。

关键词: 火塘;大房子;群体交流;文明演进

中图分类号: K21;G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669(2025)02-0013-12

文明与国家起源问题,历来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重大学术课题。随着我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深入,这一问题更是成为学术热点,相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学者们从文字、宗教、农业、政治、城市等方面进行的分析不断深化了我们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①。从食物与飨宴的角度探析中国文明的演进,是一个颇为有趣的方向,逐渐受到学者们的重视^②。旧石器时代的绝大部分时间,人类的演进基本处于停滞或者说是极其缓慢的状态,到旧石器时代后期及新石器时代,文明的演进突然提速,而食物与宴饮在这一提速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火塘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普遍使用的人工用火设施,大房子是新石器时代聚落的集会与礼仪中心,从火塘到大房子的演进,是人类的食物与宴饮活动持续发展的历程,也是社会不断复杂化、阶层分化和政治权威产生的过程,可以说,食

物、宴饮与文明演进交互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从火塘到大房子演变历程的综合分析,从食物与宴饮的视角加深对中国早期文明历程的认识。宴饮对中国古代政治、社会、宗教和文化的影響力持续不衰,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宴饮塑造了中国古代文明的某些特质,将这一问题追溯到石器时代,从源头探析就具有了更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火塘与人类进化

旧石器时代早中期,人类尚处在自然界食物链的中段,谨慎地躲避大型猛兽,依靠采集野生果实和捕获小型动物而生。除了粗糙的石器和木器,他们缺乏捕猎的工具,群体的交流与合作还处在非常初级的层次,难以有稳定的猎获,

收稿日期:2024-12-16

*基金项目: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早期秦文化与甘肃地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历程研究”(2023ZD009)。

作者简介:薛小林,男,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甘肃兰州 730000),主要从事先秦史、秦汉史研究。焦建平,男,宝鸡先秦陵园博物馆助理馆员(陕西宝鸡 721000),主要从事先秦史研究。

肉食是稀少难得的^③。人类可能是通过拾取肉食动物捕猎后遗留的腐肉和骨骼残骸,来获取必要的脂肪与蛋白质,他们用石片刮下牢固附着在骨头上的筋肉,用石器砸开骨头吸食骨髓。绝大多数时候,人类的食物以素食为主,我们很难将此时人类的饮食与自然界的其他动物区分开来,他们生吃能够获得任何食物,亦没有固定的进餐时间和地点,更没有群体性、社会性的共餐宴饮活动。直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火的使用和火塘的普遍出现,使原始人的食物与饮食方式发生重大变革,并对其思维水平与群体组织产生深刻影响。凡是被人类有目的地使用、维护并存在燃烧过程的火堆,都可以称为火塘^④。

虽然最早的人类用火证据可以追溯到150万年前,但有学者认为,早于15万年前的古人类用火证据都存在争议^⑤。我国境内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疑似人类用火遗址数量有限,加之这些遗址距今年代太过久远,分布零星,而且发掘年代较早,相关信息散失严重,很难肯定地判定存在人类的主动用火行为。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数量并不多,其中有用火遗存的遗址更少,很难勾勒出旧石器时代中期原始人用火的规模和频率,也难以估测火对他们生活发生的影响和意义。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原始人用火的遗迹更为明确,分布更加密集和广泛,在大多数遗址中均发现人工用火的设施——火塘,清理出灰烬层、烧石、红烧土、烧骨,充分证明了燃烧事件的发生^⑥。我们以新近发掘的宁夏水洞沟遗址与山西柿子滩遗址为例,探讨旧石器时代晚期火塘对人类生存的意义。

2003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对水洞沟遗址第2地点进行了4次发掘,划分出7个文化层,其中第2文化层揭露面积达80m²,遗迹遗物最为丰富,年代推定为距今31000年至29000年之间。水洞沟第2地点发现的用火遗迹有11处,其中7处分布在第2文化层,这些用火遗迹均为在原地平面堆烧形成,范围清晰,呈不规则圆形,“虽然未发现明显的火塘构筑行为,但各处用火遗迹范围集中,且CL2文化层的部分用火痕迹附近或内部发现烧石,应该属于有控制用火”^⑦。第2文化层的7个火塘,要么是相距非常近,要么相

互连接甚至互相叠压,不大可能是同时使用的,可能分属于不同时期的水洞沟人,相隔时间难以断定,但至少能够说明这一地点被水洞沟人反复使用,以火塘为中心,构成了他们的一个重要生活营地^⑧。在火塘周围,散落着数量众多的石制品及碎屑、动物烧骨、骨制品、炭屑、鸵鸟蛋皮串珠,以及一枚骨针。通过这些遗迹和遗物,我们可以尝试着复原水洞沟人的生活与观念。

柿子滩遗址位于山西省吉县黄河支流的清水河畔,2000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展开了3次发掘,发现多处火塘遗存,出土遗物与水洞沟遗址类似,包括石器、动物烧骨、鸵鸟蛋皮串珠、骨针,此外还有蚌壳饰品及磨盘。柿子滩遗址的年代晚于水洞沟,距今大约16000年至10000年,与新石器时代衔接。火在柿子滩人的生活中出现得更为频繁,以S29地点为例,发现人工用火遗迹有285处。考古学家将S29地点的地层堆积划分为8个文化层,其中第6文化层用火遗迹保存最多,在0.5m厚的地层中连续叠压有5组用火遗迹,每组有4至9个火塘,大致呈等距离分布,一字排列,方向与近旁的清水河流向一致^⑨。柿子滩最常见的火塘类型与水洞沟一样,是平地堆烧,有的用砂岩石块围挡,控制火的燃烧范围。此外还有升级的火塘,底部呈凹陷的坑状,有清晰的红烧土壁,土壁内侧边缘竖立有砂岩石板。最高级的两处火塘,以砂岩石板铺底,底面中心略内凹,在其上生火,上方还覆盖有两块砂岩石板。柿子滩人除了将食物直接放在火上炙烤外,可能发明了某种“石板烧”,将食物放在火塘上方的砂岩石板上进行烹饪。

在柿子滩遗址S29地点的285处用火遗迹中发现了5000多件骨骼,可鉴定的动物种类有普氏野马、蒙古野驴、普氏原羚、河套大角鹿、麝牛,此时柿子滩人的狩猎能力大大提升,能够猎获的动物种类和数量都有了显著增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柿子滩遗址出土的85件手工装饰品,其中蚌壳质49件,鸵鸟蛋壳质35件,骨质1件^⑩。与水洞沟遗址一样,这里流行用鸵鸟蛋皮制作串珠,同时还用蚌壳制作穿孔装饰品。S29地点发现的20件鸵鸟蛋皮饰品都是成品,其中6件有明显使用过的痕迹,有些串珠表面残存有赭色颜料。柿子滩出土的蚌壳质饰品非常精

美,有一件蚌器长44cm,宽近40cm,一端自然弯曲,另一端打成三角尖形,两侧边经过精细雕琢。还有一件仅长1.38cm,宽1.14cm,厚0.24cm,被雕琢成儿童面形,单向钻两孔为双目,刻线为眉,是非常精致传神的工艺品。这些蚌壳饰品都用火烧过,呈黑色或砖灰色,因经佩戴而表面光滑,穿孔处可见绳索磨蚀的痕迹。柿子滩遗址出土装饰品的原料中,鸵鸟蛋皮来源于当地,蚌壳则产自沿海浅海区域,可见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群迁徙、交流与物资交换有了很大的发展。

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的考古材料有限,人类可能正在摸索着用火,火塘处于零星的、初级的阶段。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原始人已经普遍、频繁地使用火,火深刻改变了他们的生存环境、饮食方式、思维方式与社会关系。从对火感到陌生恐惧,到试探性接触和使用火,再到熟悉并控制火,这一过程必定异常漫长,耗费几十万年甚至上百万年亦不无可能。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火塘大量出现,原始人与火开始共生了,他们围绕火塘构建生活营地。通过对火塘及其周边遗物的分析,可以发现距离火塘较近的地方,遗物密度大、种类多;远离火塘的外部区域,遗物密度逐渐变小。可以说火塘成为原始人的生活“聚焦”点,水洞沟人与柿子滩人都是如此。围绕着中心火塘,我们的祖先可以制作石器,所以发现了很多石制品及碎屑;火塘周边遗留了大量的动物烧骨,可知水洞沟人与柿子滩人已经在火塘上炙烤猎物,与群体其他成员交谈并分享食物;先民们在火塘边缝制衣物,出土的骨针表明他们具有很高的骨器制作水平,以及利用兽皮及某些植物纤维制作衣物的能力;用鸵鸟蛋皮制作串珠,用蚌壳制作装饰品,既展现了先民们高超的手工技艺,亦反映了他们的认知与审美水平。

考古学家在以色列的凯塞姆洞穴发现了40万年前原始人的牙齿化石,他们利用生物分子技术对牙齿化石上附着的沉积物进行了分析,得出原始人的食物谱。原始人食用大量的植物种子、根茎,蘑菇,绿叶蔬菜以及昆虫,也食用肉,只是还无法分析肉的种类以及他们获取肉食的方式。柿子滩遗址中出土有三件磨盘,经

过微痕与残留物分析,三件磨盘均有使用的痕迹,柿子滩人利用磨盘加工种子、块茎和坚果等富含淀粉的食物。考古学家在一件磨盘上提取了126粒淀粉颗粒,小麦类占三分之一,其余是山药、葫芦、豆类、黍类^①。旧石器时代的人已经能利用石板加热食物,利用动物的胃或者皮革烹煮食物,柿子滩人的火塘上覆盖的砂岩石板,可能就是用来炕制石磨磨碎的淀粉类食物的工具。

火塘最直接的功能是加热烹制食物,使人类进入稳定的“熟食”阶段。人类是如何发现、喜欢并追求大火烧烤之后的熟食的?也许出于“偶然”,例如在森林大火过后,人类偶发性接触到经过大火炙烤的肉食,肉的表面因大火加热发生焦糖化反应,色泽更加诱人,软糯的口感更令人感到满足,人类的口腹之欲被激活,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也是为了“好吃”,这可能是促使人类探索火、利用火的原始动力。从“生吃”到“熟食”对人类生理结构会产生重大影响,这一变化可能奠定了人类进一步进化的生理基础。在没有熟食之前,人类的生理结构是适应茹毛饮血的,练就了坚硬锋利的大白齿、强壮的颌骨,以及复杂强大的消化系统。火的使用,把需要人类口腔和肠胃做的部分咀嚼和消化工作转移到体外,烹饪之后的熟食更加软糯,易于咀嚼,更好消化,于是人类的白齿逐渐变小,颌骨慢慢变得柔弱,消化系统也更加高效^②。体质人类学家发现,人类与其猿类近亲,每日需要消耗的总能量是非常接近的,但以树叶和果实为生的猿类,拥有更为复杂的肠道,它们大量的能量消耗于消化系统。人类却因为熟食,在消化系统的运作中节省了大量的能量^③。那么,节约的能量用在哪里了呢?

人类进化的秘密就在这里,这些能量被转移到了大脑,用来供应人类越来越发达的大脑运作的需要。人类的脑容量在进化的过程中持续增长,虽然现代人类大脑仅仅占到人体体重的2%,但却要消耗掉20%的能量,大量神经元在释放与回收递质的过程中需要耗费大量能量。通过利用火获得熟食,人类有了更大的能力来解放消化系统,将更多的能量补偿到逐渐增长的大脑,而大脑的进化,又为人类更好地利

用火、更高效地获得食物追求美味提供了智力支持,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进化过程。使用火进行烹调,扩大了人类的食物范围,一些生吃有毒,加热后能够祛毒的食物,就成了人类的独有特供,例如亚马孙人的主食木薯就是如此,经过研磨、浸泡和加热等程序,木薯的毒素被分解,成为人类的主食^④。火的使用,还减少了人类生食时容易感染的疾病,提升了人类的体质健康水平。从个体层面说,火对人类生理体质的进化产生了重大的有益推进,肠道系统的简化、脑容量的增长、更健康的体质,这些变化都源自对火塘的利用。

二、文明的催化剂:群体交流与自我意识

火塘除了增进人类大脑与体质的进化外,对人类个体思维的发展、群体凝聚力的增强,也产生了较大的驱动力。在火塘营地的领域内,人类不必再担惊受怕,能享受片刻的闲暇与自由。人类一旦有了安全、闲暇与自由,就有机会进行更多的交流、思考与想象,语言、思想、艺术、审美、自我意识等更高层次的活动就能够滋生萌芽,从而加快人类走向文明的步伐。火塘之所以能够成为原始人生存空间的“聚焦”点,是由于其最主要的功能是烹饪。自从掌握了火之后,原始人已经完全接受了熟食,喜爱上熟食的滋味。将这些美好体验与群体分享,被人类视为有益的和快乐的事情,“直到火与食物结合在一起后,大势所趋,社区生活的焦点才沛然成形。进食以独特的方式成为社交行为:共同进行却不必同心协力”^⑤。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一般结合成为小型的游团群体,规模在30至50人不等,内部存在初步的分工与协作,但凝聚得还不够充分。没有火塘之时,猎获的食物分掉之后各自进食。有了火塘之后,由于火塘需要消耗燃料,不可能一直保持旺火状态,所以大家都在相同的时刻聚拢在火塘周边烧烤食物,火塘边温暖、光明、安全,原始人获得更多的机会来分享食物与谈话交流,于是火塘边的烹饪、进食、交流,就成为一种集体行为。集体行为终将发展为某种秩序,谁

照料火塘,谁负责烹制食物,谁来分配,谁来传递,分工与权力在这个过程中暗暗萌生。正如马丁·琼斯所言:“在食物分享和由此形成的礼节和交流中,人类显示了其本质特征,从自然中被区分出来。一顿饭实际上体现了不同的社会关系,体现了一种‘文化’,这正是我们人类所特有而其他物种所缺少的。”^⑥火塘还促进了人类语言功能提升,起初原始人发音模糊,音节简单,只能进行简单的信息交流。当火塘提供了交流的空间和时机时,人类的语言潜力得到开发,语言能力跃升。

火塘的使用,延长了人类的活动时间,在太阳落山之后仍能安排很多活动。在进食完毕之后,游团成员们仍然围坐在火塘周边,有的制作石器,有的使用骨针缝制衣物,有的在雕琢装饰品,大家边劳作边交流。有了火塘,游团群体内部的交流变得更为充分:前辈向新手传授火塘的使用和保存技巧,燃料的获取方式,以及各种取火方式;打制石器的“专家”向其他成员传授经验,几个石器制作者之间讨论新形制、新功能的石器;打猎能手向大家描述自己的狩猎过程,分享若干经验,让大家注意不同猎物的习性差别、出没地点与危险隐患;群体的首领会安排下一次狩猎活动,嘱咐不要与邻近游团发生冲突,或者准备与敌对游团展开一场猎场的争夺。通过火塘周边的交流,团队成员的技术水平、对自然的认知能力都得到了提高,同时,游团成员也加强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在自己的群体中,谁是最有经验的狩猎者,谁是最强悍的战士,谁能够轻易找到果实最丰富的采集地,谁能点燃火堆,谁在食物的储存、烹饪、分配方面做得最令大家满意,大家逐渐形成一些共识,群体内部因此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分工,各领域的“权威”得到大家的信任与支持,群体的内部凝聚力增强,劳动效率更高^⑦。

旧石器时代后期,原始人狩猎的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肉食成为他们食物中的主角,但不能高估肉食在他们食物中所占的比重。火塘边的宴会如果缺乏肉食来分享,宴会则丢失了灵魂。在原始人的所有活动中,狩猎活动最能激发他们的欲望、协作与创造力。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只是可怜的食腐者,他们缺乏猎获大

型动物的能力,只能寻找凶猛的肉食动物捕猎饱餐之后的残肉剩骨。到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群体的协作水平有了提高,能制作更多样的石器,并开始使用火,他们开始不满足于腐肉,渴望更好更新鲜的肉食,于是他们发明了一种特别的方法——尾随肉食动物,在捕猎成功后,凭借人多势众和石器、骨器、火把,驱赶并抢夺其猎物——人类此时扮演着猎物“劫匪”的角色。到旧石器时代后期,人类发明了飞石索、弓箭、石球等远距离攻击的武器,能够更密切高效地合作进行围猎^⑧。获取肉食的需要刺激了人类发掘自身潜能,发明更高效的武器,展开更紧密的合作,观察并掌握动物习性,利用自然地形。总之,持续性的狩猎需求,驱动了人类认知能力的发展,并有效调动了人类的社会协作能力与创新能力。

水洞沟人和柿子滩人在火塘边制作鸵鸟蛋皮串珠和蚌壳饰品,这些饰品并没有实用价值,却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源,蚌壳更是来自于遥远的海滨,并非当地的物产,需要与其他人群进行交换。这些火塘周边出土的装饰品,反映了原始人的审美情趣、想象力与自我意识已经到达了相当高的水准,对于打开人类文明的大门,这些是更为关键的要素。在距今5万年左右,在非洲坦桑尼亚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最早的鸵鸟蛋皮串珠。从距今大约4.5万年起,装饰品普遍出现在非洲和近东地区,使用鸵鸟蛋皮制作串珠,是各大洲都流行的行为。这些装饰品已经超越了“实用”范畴,穿戴的各种装饰品是一种重要的信息传递介质,向他者传递自身的“不一样”,装饰自己,显示身份,传递美感,吸引目光,赢得尊重^⑨。彼得·沃森认为:“人与人之间的装饰差异,也表明早期人类具备一种‘自我’感。”^⑩对装饰品的追求是旧石器时代后期人类的共性,装饰品成为了重要的交换物资,其背后可能也有某种宗教观念,促进了不同区域人群的交往,有利于人类形成更大规模的群体。

旧石器时代后期,人类终于摆脱了恹恹惶惶的生存状态,在火塘边享受熟食后,还有一定的闲暇与自由,由此萌生了群体内部的交流,以及对美的追求。追求美,意味着人类的自我意

识有了跃升,文明的高级要素宗教、艺术、思想等,都建立在自我意识的基础之上。在火塘边发生的熟食烹饪、食物共享、群体交流、艺术创作、想象力跃进,为人类的文明演进增添了动力,积蓄了能量。人类在这一时期,努力克服自身的局限,发挥自身的优势,逐渐走向文明,特别是当火塘成为他们生活的中心后,这一历程就加速了。

三、新石器时代的新景观:大房子的出现及其功用

旧石器时代早中期,人类的演进处在缓慢甚至是停滞时期。直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演进突然加速,在5万年的时间里,实现了技术的迅速提升,自我意识、群体凝聚、审美与想象等各方面都得到跃升。各地区的人类社会通过区域结盟和远程贸易,文化技术实现了较多的交流,他们的社会更加多样化,也充满了进一步发展的动能因素,这一变化学者们称为“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⑪。进入新石器时代,人类开始定居的生活,通过对野生动植物生长的干预与管理,逐渐产生了农业和家畜驯养,能够制造更先进的工具,陶器作为先进的烹调用具得到普遍使用,形成了专门的手工作坊、公共建筑和墓地,集体性宗教祭祀事务明显增加,生产技术、社会组织和文化表达都取得一定的突破,复合推动着文明的进一步发展。相较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文明更进一步的发展,需要新的推动因素——差异、不平等与政治权威。早期文明与国家的诞生,是生产力发展与政治组织复杂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治权威的作用愈益突出。新石器时代作为“通向国家之路”,并非完全平等的社会,各种不平等的因素在这一时期不断积聚,而定居聚落中大房子的营建与使用,在其中起到颇为重要的作用。

新石器时代最具视觉冲击力的“景观”,是大房子的普遍出现,几乎所有面积较大的仰韶文化聚落遗址中,都会有一至数座大型房子,可以说,大房子与仰韶文化相始终^⑫。相较于聚落中其他小房子,大房子一般位于“中心”位置,具有规模更大的基址,通过多个柱子支撑,更为宽

阔。地面经过特别处理,更为坚硬和平整。大房子中的出土物缺乏日用品,修建这样的大型建筑并非用于日常居住生活,应该有着对于聚落来说更为关键的用途。汪宁生结合世界各地民族风俗,总结了大房子的四种主要用途:一是公共住宅,是聚落成员共同居住的地方,大房子之中区隔为许多小间,供各个小家庭居住;二是用于集会和公共活动,聚落成员在此集会、闲谈、娱乐,招待宾客,举行盛宴,储藏宗教仪式用品,也会用作特殊人员的临时居处;三是作为男子公所或妇女公所;四是作为首领住宅,部落首领的住宅比普通成员的房子要大一些,建筑材料更好,内部装饰更为讲究,有时候也兼具部落集会场所的功能^⑧。仰韶文化的几个主要遗址——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灵宝西坡和秦安大地湾——都发掘出大房子的基址,这些大房子对于部落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大房子的建造及其使用,对部落的聚落结构、阶层差异和酋长权威等方面,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西安半坡遗址距今6700年左右,持续使用了500多年,发现的房屋基址保存完好的有47座,前期约20余座房址,在聚落中均匀分布,面积相差不大,在10—20m²之间。到后期,半坡人在聚落中心位置修建了大房子F1,南北残长10.8m,东西残宽10.5m,面积达160m²,墙体宽度有1m,屋顶由四根大柱支撑,墙壁、地面均经过特别处理,坚硬平整^⑨。有意思的是,后期的其他小房子不再是均匀分布,而是向外围壕沟一侧退缩,与F1拉开距离,留下较宽阔的空间。距今6000年左右的临潼姜寨遗址的大房子及聚落布局则又有不同,其中的大房子并不止一所,亦非位于聚落的中心位置。姜寨遗址的中心是一个露天大广场,100多所房屋都围绕着中心广场,大致分为5组,每组有一所大房子,四周围绕着众多中小型房屋,5所大房子的面积在80m²左右,其他房子在20m²以下^⑩。

灵宝西坡遗址距今约5500年,其中最大的大房子F105平面略呈弧角正方形,南北长19.85m,东西长18.75m,面积达373m²,室内面积204m²,加上外围的附属建筑,总面积达到惊人的516m²。F105的主室是半地穴式建筑,四周回廊与地面近平,总体上是地面与地下相结合的

建筑。室内柱洞对称分布,考古学家推测可能有四面坡式的方锥体屋顶,而且可能是重檐。F105的居住面、墙面和部分夯层表面均涂成红色,在墙壁柱洞底部的柱础坑周围也发现辰砂,这种红色物质往往被认为与某种原始信仰有关^⑪。秦安大地湾遗址距今约5000年,遗址中的大房子F901面积达到290m²,以主室为中心,两侧有相通的东西侧室,主室后面修建有后室,前面有附属建筑和宽阔的空场地,加上附属建筑面积达到420m²。F901被称为是中国最早的宫殿雏形,正厅有两个大柱作为顶梁柱,南北两墙各有8根附墙柱,形成了八柱九开间的布局,这一形制为后世宫殿沿用^⑫。居住面坚硬平整,色泽光亮,做工考究,表层基本处于同一水平线,裂纹极少。表层之下是15—20cm厚的由砂粒、小石子和非天然材料组成的混合层。在正殿中部稍前有一个圆形大灶,由约40cm厚的坚硬红褐色土围成,基部外径南北2.51m、东西2.67m,高0.5m。大房子里出土的陶器,多大型器,四足鼎、敛口小平底釜、条形盘、带环形把手的异形器,这样的特异型陶器群,与一般生活居址出土的陶器类型有很大的差异,应该具有特殊的功能^⑬。

定居聚落的形成,构成新石器时代的第一道景观。很快这一景观就发生了变化,聚落之中,在中心或者其他醒目的位置,更为宽阔并经过精心装修的大房子普遍出现,在一群低矮狭小房子的映衬下,成为新石器时代聚落的“聚焦”点。新石器时代的人们为什么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去修建“大房子”?事实上,大房子不仅是视觉焦点,也是整个聚落组织的焦点,是推动整个新石器时代演进的关键。

定居时代开始后,人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处在平等状态,部落成员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等级划分,即便是部落首领,也没有更多的财产、更高的地位,没有更好的住所,所有成员的房屋都在10—20m²之间,均匀布局在聚落之中。大房子产生之后,大多数大房子占据聚落的中心位置,而且与其他中小房子拉开空间距离,高大宽敞,一目了然,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围绕大房子的建造、维护与使用,先民们的生活模式、部落内部的权力结构都将发生一系

列的变化。

仰韶文化遗址的大房子均与同时期众多的小房子并存,故而不太可能是公共住宅。在民族志中出现的作为公共住宅的大房子,其中都分隔成为若干小间,供小家庭居住,而仰韶遗址的大房子都是开阔的大间,大地湾的F901更是具有八柱九开间的宏阔气派,并没有内墙将之区隔成平均的小间。半坡、西坡、大地湾遗址的大房子处在聚落的核心位置,周围的小房子是部落成员日常的居处,大房子很可能就是用于集会或公共活动,是超越于部落成员日常生活的更高存在。姜寨的聚落中心是空旷的大广场,围绕中心广场可以区隔出5组房屋群,每个组群由数目相近的房屋组成,所占遗址面积也大致相等^⑨。这种布局大概反映了姜寨聚落的内部结构,每个组群是介于核心家庭与村落集体之间的血缘群,整个聚落由5个血缘群组成,5所大房子是各自血缘群组的中心。姜寨聚落中小房子的平均面积为12.7m²,大房子平均面积81.7m²,是前者的近7倍,但却比半坡、西坡和大地湾遗址的上百平方米的大房子小很多。半坡、西坡和大地湾遗址的大房子很少出土日常生活用品,但姜寨聚落5个大房子中4个有火塘,同时发现了存储食物的窖穴和处理废弃物的灰坑,并不能排除是居所性质。从面积上来说,每所大房子都能容纳血缘群的大部分成员在此参加集体活动,结合民族志中作为部落首领住宅的大房子,学者们都倾向于认为姜寨的5所大房子是5个血缘群头人的住宅,同时也是血缘群举行集体聚会与仪式的场所^⑩。更大规模的集体活动,可能是在中心广场举行。整个姜寨部落的酋长,应该是从这5个血缘群头人中产生,于是各个群落之间就会有竞争与冲突的可能性。一条外围壕沟和中心广场,是姜寨部落共同体的表征,平等主义仍然是通行的法则。但血缘群头人的大房子,以及血缘群之间的竞争关系,在整个群落中酝酿着差异和等级的演进势能。

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遗址中的大房子主要是作为聚落集体事务与礼仪活动中心而存在,亦有作为部落酋长或血缘群头人家庭住宅的情况,但同时兼具了群体集会中心的功能。这意

味着大房子的修建与部落集体性事务的突出有密切关联。那么,是什么样的集体事务,动员了整个部落的人力物力来修建大房子呢?

新石器时代的部落组织规模越来越大,例如姜寨,内部分蘖出5个血缘群,但血缘纽带的凝聚力只能保持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如果说血缘纽带在血缘群中仍能保持有效的凝聚力量,那么在血缘群之间,血缘的凝聚力可能衰减。部落必须寻找新的方式来加强集体的凝聚力,宗教就逐渐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影响人类历史最深的精神因素之一。蒲慕州认为,所谓宗教指的是“对于人之外的力量的信仰”,这种力量可以主动或被动地作用于人和社会,从而改变其命运^⑪。我们也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宗教”这一概念。

在旧石器时代,一些不同寻常的物品,包括赭石涂料、人形泥塑或者雕塑、石头或骨头上雕刻的图案和符号、洞穴里的壁画、精心雕琢的珠子和蚌壳陆续出现,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这些物品在人类社会中的出现越来越频繁,它们是人类想象力与审美能力跃升的体现。然而,又是什么在驱动人类的想象力与审美力的提升?他们最终指向哪里?答案很可能就是宗教信仰。随着人类大脑的进化与社会组织的发展,人类具备了“共同意向性”,所有人能够自觉地同意相同的认知和情感的解释。早期人类在面临日常世界之外的东西——日食、血月、地震、洪水——会通过情感和体验的沟通与协调来达成对特定现象的全新体验的共识,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分享了超自然的体验^⑫。早期人类意识到在大自然的幕布背后存在神秘的力量,这种神秘力量超出了人类的理解与认知,对这种神秘力量的信仰、侍奉与祭祀,能够缓和人类与自然、社会之间的紧张,满足人类的心理期待。虽然不同地域原始人信仰的对象各有不同,但他们在应对自然与社会挑战的过程中,产生了宗教信仰及其仪式——一种高级的认知与情感,并通过宗教信仰来增强组织合作、抽象思维、情感共鸣以及集体认同感。宗教信仰的纽带能帮助人类超越血缘局限,结成更为复杂、庞大和紧密的群体,开展有效的沟通与协作。在人类早期的历史中,宗教信仰先于政治权威,成为凝结

部落的重要纽带。那么,举行宗教仪式,向信仰对象献祭、诉说并进行通感,成为首要的集体性事务。

姜寨遗址外环绕有一条宽2.2m、深1.7m的壕沟,这个宽度和深度对于防御敌人或者野兽来说,都是最低程度的,功效非常有限。姜寨人的两块墓地在居住区的东边和西南边,那么壕沟的作用可能是象征性的区隔,“将村落文化群与此边界以外自然界和/或超自然界分开的认知边界的具体表现”^⑧。姜寨人已经具有了较明显的宗教观念。

大房子修建的时代仍然是部落平等时代,等级差异、政治权威和控制技术等尚未发展起来。大房子的修筑是新石器时代人类各方面能力的综合体现,不仅仅是建筑能力,还包括设计规划的想象力,实施的组织力和技术创新力,在缺乏政治权威的情况下,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人力物力资源,激发人类潜能的事物,大概只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了。大房子的普遍出现表明新石器时代集体性事务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而首要的集体性事务就是与宗教信仰有关的仪式与宴飨。

四、大房子中的宴饮与酋长权威的建构

神的食物与人的食物具有同构性,也就是说,人吃什么,就将什么奉献给神。春秋时期随国国君不无自豪地夸耀自己对神的祭祀:“吾牲牷肥腍,粢盛丰备,何则不信?”^⑨进入新石器时代,人类发展了农业和畜牧业,黍粟稻等谷物成为主要的粮食品种,驯化了猪狗羊牛等家畜。粢盛和牲牷的组合,在新石器时代的开端,就成为人类自己及向神供奉的食物搭配。由于农业与动物驯养的产生,人类的饮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若缺乏陶器,这一新阶段将难以落实。

陶器是人类探索物理特性、利用自然资源而做出的创造性发明,成为新石器时代最为普遍的烹饪器、饮食器与储藏器,也是酿酒的重要容器,可以说陶器重塑了这一时代的烹饪与宴饮史。人类对制作陶器的探索与尝试,要早于定居和农业的产生,在一些旧石器时代末期的

遗址中,就已经发现了陶片,如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中出土的陶片,显示出在进入定居和农业之前,采集狩猎者们就开始使用陶器了^⑩。曹兵武认为,陶器的产生早于农业的诞生,在中国南方,15000年以前就开始了制陶的实验,到距今9000年左右大致完成了陶器的发明与探索,陶器成为普遍存在的文化因素^⑪。

旧石器时代的火塘烹饪主要是在火上直接炙烤,这一方式有很大的缺陷,有些食物并不适合直接炙烤,而且老人和儿童的牙齿与消化系统,并不适宜食用过多的炙烤食物。探索新的烹饪方式、寻找新的烹饪载体成为原始人的重要任务。从考古遗物和民族志的有关材料来看,“石烹法”曾经广泛流行。最初某个时刻,或许是地热温泉附近的原始人最早发明了水煮法,随着他们的迁徙或者文化的交流,其他地区的原始人触类旁通,发明了石烹法,即在平地上掘一浅坑,用皮革铺垫后盛水,在坑边设置火塘,炙烤石块,待石块通红后将其置入水中,稍后取出冷却的石头,并不停地放入新炙烤的烧石,如此循环,直到坑中的水沸腾并煮熟食物。从技术来说,石烹法是何人掌握了火塘技术的原始人都能使用的。今日云南傣族人杀牛之后,在地上挖一个坑,用牛皮垫在坑底及边缘,盛水放肉,然后将烧红的石块投入水中,水温不断升高最终煮熟牛肉。用这种原始的方法煮熟的牛肉是祭神用的,可见石烹法有其古老的渊源^⑫。为了克服水火相克的矛盾,原始人尝试过用很多烹饪载体进行水煮,例如鄂伦春人使用动物的胃,民族志中还可见使用竹子、桦树皮、木桶和动物皮革等载体。但这些方法都有缺陷,石烹法程序复杂,通过热量转移的方式加热,耗时长,效果也一般,而竹子,动物胃、皮之类的烹饪载体,在耐火性和可塑性方面,都存在巨大缺陷。

陶器的发明是内外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部因素是末次冰期的最盛期造成的环境变化,中国各地的气温明显下降,对于原始人很重要的一些食物资源逐渐消失,面对挑战,人类不得不扩充自己的食谱,想办法食用一些以前吃不了的食物^⑬。这些食物直接用火烤难以食用,而用水煮则是上佳的烹饪方式,比如禾本

科植物的种子,以及水生的贝类,经过炊煮是最佳的食材。内部因素是对火、泥土物理特性的认识,经过上万年的技术积累,已经达到了突破的临界点。早期人类就跟当今人类的孩童一样,富有探索与游戏精神,“玩泥巴”大概是历史最为悠久的游戏,人类逐渐认识到了泥土的可塑性,并发挥想象力进行各种创造,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泥塑女神像,已经是较高级的产品了。旷野中的火堆能达到600℃,如果加入外部空气助燃,能够达到800℃,满足了陶器烧制的温度要求。旧石器时代后期的原始人在用火的过程中,观察到火塘中的泥土硬化,或将肉裹着泥土在炭火中烘烤时,发现泥土硬化成不渗水的新物质形态。当寻求水煮载体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时,技术也完成了积累,最后终于发展到陶器的制作。经过高温烧制后,成型的陶器具有极好的耐火性,坚硬、不渗水,还能防潮,是储存水、粮食,以及进行水煮烹饪的完美载体。

陶器的发明使得人类能够最大限度地食用禾本科植物的种子,黍粟麦稻等可以长期储存的粮食成了农业生产的主要品种。陶器成为主要的炊器后,人类增加了煮和蒸等烹饪手法,可食用的动植物品种更多了,也能更充分地利用食物,美味糜烂的肉汤和粥食非常适合老人和小孩食用,提高了孩童的成活率以及延长了人均寿命^⑧。此外陶器对人类文明更重要的推动,是它作为酿酒器和饮酒器,催生了人类的最早“盛宴”。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都认为“酒”是农业文明的副产品,有了农业和粮食储存之后,才有了酒的酿造。20世纪50年代后,学术界对农业与酒关系的认识逐渐被逆转,旧石器时代的人早已发现自然界的“果酒”,摸索了原始的酿酒技术,人类要追逐更多的酒,就必须生产更多的谷物,于是农业才产生并发展^⑨。无论是远古时代还是今天,人类为了追求兴奋与麻醉等体验,各种具有兴奋与麻醉功效的动植物,都被人类发现并尝试,甚至包括去舔尝有毒蟾蜍,或者冒着腹泻呕吐的风险去喝致幻藤水,为的就是获得一时的迷幻或癫狂^⑩。但有毒物质对人类身体的损伤过于剧烈和不可逆,而“酒”就显得温和多了,适量饮用就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特别是

进入迷乱状态后,能够与神沟通。酒精能够通过人体循环系统消解或者排出,第二天酒醒之后一切恢复正常,并且酒的口感好,易于饮用,与食物能够完美搭配,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森舸澜指出,酒能够“增强创造力、缓解压力、建立信任,以及让部落思维根深蒂固的灵长类动物与陌生人奇迹般地实现合作。把自己灌醉的欲望,以及醉酒对个人和社会带来的效益,对促进大规模社会的诞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⑪。人类各地的文明不约而同地发明了酒,酿酒的原料、花样和形式千奇百怪,共同汇聚成酒与人类文明共生的形态。

陈淳将关于农业产生的理论归纳为如下四种:首先是人口压力理论,当人口增长,与资源发生失衡的时候,人类必须寻求和创造新的食物资源,农业作为应对压力的生存策略而诞生。第二种与压力理论相对,认为农业产生于资源丰富的采集文化之中,人类只有在食物充足,能够免于饥饿的前提下,才会选择并改进植物品种,并尝试种植。然而,在资源丰富的情况下,人类为什么要费心费力进入种植收获的生存模式中?有学者提出第三种理论,由于首领人物需要通过竞争性宴飨来控制劳力、获得威望并掌握资源,而劳力投入高的农业能够获得更多美食和美酒,以用于支撑竞争性宴飨。第四种理论认为,随着社会复杂化的发展,少数群体试图扩大资源消费来控制其他多数,为了控制更多的剩余产品,于是推动了向农业生产的转型^⑫。其实,后三种理论具有共通性,可以共同解释农业的产生,即随着社会复杂化的发展,部落领袖要通过举办竞争性宴饮来获取更多的威望和服从,而举办竞争性宴饮需要更多美食、美酒以及其他剩余产品。加强对动植物的驯化与驯养^⑬,是获取这些资源的最有效途径,于是推动了社会转型到农业社会。

最新的考古证据显示,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贾湖遗址发现了最早的酒的残留。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从事科技考古的麦戈文团队对贾湖遗址出土陶片上的残留物进行了提取和分析,证实了这些陶器“曾经用来加工、储存和盛放一种由大米、蜂蜜和果实(葡萄或山楂,也可能是龙眼或山茱萸)制作的混合发酵饮料”^⑭。

贾湖遗址距今9000年,却并不意味着人类酿造酒的历史只有9000年。要注意的是,酒与陶器虽然都产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但二者的推广流行并对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是在与农业结合之后的新石器时代。刘莉等对新石器时代大房子与酿酒的关系做了深入的考察,发现尖底瓶、漏斗、罐、瓮、碗、钵、缸和灶是与大房子同时出现的遗存组合。通过对陶片残留物的分析,小口尖顶瓶、小口平底瓶、瓮、漏斗等,都是酿酒的容器,其他陶器和灶,则是举办宴饮的厨房设施和器具^④。

刘莉等还原了新石器时代酿酒的工序,包括浸泡、发芽、糖化和发酵四个步骤:第一步将谷物浸泡在大型陶器中数日;第二步将浸泡过的谷物铺撒在地面上,定时洒水,并用耙子定时翻动促进发芽,所以地面必须干净、平整、坚硬;第三步将发芽的谷物捣碎,放入大型器皿中,加入热水制成醪液;第四步将醪液倒入小口容器中,封口数日进行发酵。目前发现的大房子,地面都是经过特别处理的,坚硬平整,非常适合用来铺撒浸泡过的谷物,并定时洒水和翻动以促使其发芽,小口尖底瓶和大型陶瓮则可以用来完成糖化和发酵,大房子很可能是酿酒的场所^⑤。酒在新石器时代是异常珍贵的奢侈品,掌握了酒的生产与分配,就是掌握了权力。很多大房子中设置有灶,或者有作为厨房的附属建筑。例如灰嘴山遗址大房子F1北侧,发现一堆夹杂有木炭、陶器碎片和小型动物骨骼的红烧土,陶片外表有烟痕,可能是炊器,考古学家推测是F1的附属厨房。大房子并不仅仅作为酿酒的作坊,也是举办部落集会和各种仪式的公共场所,这里酿造的酒,就是为了供应在大房子中举办的飨宴。

在人类学上,“夸富宴”得到了非常多的关注,民族志资料显示,那些雄心勃勃争夺威望的人,会竞相举行盛宴,进行炫耀,看谁提供的食物数量最多。例如美拉尼西亚和新几内亚部落中的“大人物”,一生要操办多次宴请活动,来竞争或维持自己的地位。每一次成功的夸富宴,都能为头领和他的追随者取得更多的荣耀^⑥。新石器时代早期,部落内部尚未发生分化及出现差异,大体延续着平等的结构,从墓葬和居址

来看,尚未有特殊的个人存在。但从来不会有绝对的平等,随着聚落规模的扩大,公共事务的比重增加,狩猎与军事、宗教与仪式等方面有天赋者或能手,逐渐获得了威望和权威,成为相关事务的主持者。到距今6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原始社群开始出现分化,这一时期掌控礼仪的贵族权威出现,一些个人获得了某种政治角色,拥有了特殊的社会地位^⑦。社会分化开始在聚落内部出现,而且聚落之间也出现等级化,一些聚落被征服,服从于某个更强大的部落。从平等社会向等级社会的转型是一个充满竞争性的过程,如果说军事征服是暴力型的转型方式,那么,通过举行盛宴来竞逐权威,则是以温和的方式实现等级分化的转型。当转型完成后,飨宴具有的仪式性依然具有维系和巩固权力的作用。饮食人类学家特别强调,宴会与潜在的等级、分化和地位的竞争性变化密切相关^⑧,新石器时代之后,盛宴一直与政治权力有密切的关联^⑨。

格尔茨指出,“国家”这一名词凝缩了三个词源学的主题,分别是表示地位、名位、位阶的“等级”,表示壮美、炫耀、仪态的“威仪”,以及表示执政、统治、支配的“治理”。第三种含义是最晚起的,表示等级与威仪是国家初起时的核心意义^⑩。部落时期早期的领袖们,为了营造自身的权威和等级地位,最常使用的方法是利用“威仪”,即盛大的仪式与飨宴,来获取更多的忠诚与权威,从而掌握更大的权力。格尔茨在《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中提出了“剧场国家”的概念,认为在巴厘岛的部落中,举办盛典具有终极性的意义,即“权力是为盛典服务的,不是盛典为权力服务的”。虽然格尔茨的这一观点受到了更多的田野调查者的反驳,并且格尔茨在以后的论著中也否定了这个观点,但正如杨德睿所言,若我们将“剧场国家”的概念软化,将之视为一种启示、一种视角,提醒我们去关注分析权力与展演(借由象征和仪式)之间紧密的共生、相生关系,或者稍微再进一步,去分析特定象征和仪式的展演如何将权力和特定意义(信仰、道德、价值)体系扣连起来,从而对权力起到某种程度的塑造作用,那么“剧场国家”这个观念就会迸发出智慧的光芒^⑪。新石器

时代的部落修建大房子并在大房子中举行集体飨宴,是举行宗教礼仪的需要,也是部落首领扩张权力的需求,这二者很快就相互结合。贾湖遗址中不仅有酒,还出土了骨笛和用龟甲制作的响器,很可能是在宗教和飨宴仪式中使用的乐器。宗教与权力,成为飨宴的驱动力。在盛宴中,部落首领向全体成员供应珍贵的美酒、谷物和肉食,盛宴背后具有的宗教意义与礼仪规范,不断地强化着首领的特殊地位,并塑造群体成员的集体认同意识。

大房子中发生的盛宴,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火塘边发生的故事的继续和升级,农业与动物驯养为宴飨提供了充足的食物,陶器解决了烹饪与酿酒的技术难题,精心建造的大房子则为宴飨提供了场所。大房子举行的宴飨活动,既满足了聚落成员宗教祭祀的精神需求,也是部落领袖提升权威,巩固地位的重要手段。从火塘到大房子,主要是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5万年左右的时间,人类的文明演进突然加速,火塘带来的熟食与体质进化、语言功能提升、群体交流和自我意识萌发,成为人类文明演进的第一次助推;大房子中的盛宴背后的宗教信仰、等级分化与政治权威的诞生,则是文明演进的第二次跃进。经过两次文明跃进,人类终于走到了文明与国家的入口,即将进入下一个阶段。

注释

①相关研究众多,仅列举数项,如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严文明:《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韩建业:《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②刘莉及其团队近些年的一系列研究,推动了这一问题的深入,相关论文有刘莉:《早期陶器、煮粥、酿酒与社会复杂化的发展》,《中原文物》2017年第2期;刘莉等:《仰韶文化大房子与宴饮传统:河南偃师灰嘴遗址F1地面和陶器残留物分析》,《中原文物》2018年第1期;刘莉等:《石峁遗址出土陶、石器功能反映的礼仪和生计活动》,《中原文物》2022年第5期等。③臧振华指出,许多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因为出土了某些动物化石,便被直接推论为当时人类猎食的对象,但某些动物化石和人类饮食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联性,其间的关系显得很勉强。即使人类食用某些动物,也并不意味是猎获的。参见臧振华:《中国旧石器时代人类的饮食

证据》,载王明珂主编:《典籍文明:古代饮食史》,财团法人中华饮食文化基金会2009年版。④⑥周振宇等:《旧石器时代的火塘与古人类用火》,《人类学学报》2012年第1期。⑤向金辉:《中国旧石器时代人类用火遗存的发现与判定》,《北方文物》2020年第6期。向金辉指出用火遗存多是依靠火塘设施或是灰烬、木炭、烧土、烧石、烧骨等证据判定的,但这种直接观察难免有误差。⑦陈福友等:《宁夏水洞沟遗址第2地点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2012年第4期。⑧关莹等:《水洞沟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结构的利用分析》,《科学通报》2011年第33期。⑨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S29地点发掘简报》,《考古》2017年第2期。⑩宋艳花、石金鸣:《山西吉县柿子滩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装饰品研究》,《考古》2013年第8期。⑪刘莉:《中国北方地区旧石器时代末次盛冰期人类对植物性食物的利用》,《南方文物》2017年第4期。⑫[英]席佛顿著、邓子衿译:《与达尔文共进晚餐》,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39页。⑬⑭⑮[英]马丁·琼斯著、陈雪香译:《饭局的起源:我们为什么喜欢分享食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96—98页,第12页,第175页。⑯⑰[英]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著、韩良忆译:《吃:食物如何改变我们人类和全球历史》,中信出版社2020年版,第17页,第18页。⑱[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著、林俊宏译:《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4页。赫拉利讲到人类社会性信息交流的能力促进了群体的自我了解。而火塘边的交流,是社会性信息交流的最好时机。⑲王仁湘:《史前饮食考古四题》,《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2期。⑳王春雪等:《水洞沟遗址采集的鸵鸟蛋皮装饰品研究》,《科学通报》2009年第19期;魏屹等:《旧石器时代装饰品研究:现状与意义》,《人类学学报》2016年第1期。㉑[英]彼得·沃森著、胡翠娥译:《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51页。㉒[美]奥法·巴尔·约瑟夫:《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南方文物》2016年第1期;裴树文、陈福友:《水洞沟与“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化石》2013年第2期。㉓④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刘莉等:《仰韶文化大房子与宴饮传统:河南偃师灰嘴遗址F1地面和陶器残留物分析》,《中原文物》2018年第1期。㉔汪宁生:《中国考古发现中的“大房子”》,《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㉕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㉖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美]克里斯琴·彼得森、[以色列]吉迪恩·谢拉克等:《姜寨:中国一座新石器中期村落的社会与经济结构》,《南方文物》2015年第4期。㉔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灵宝西坡遗址105号仰韶文化房址》,《文物》2003年第8期。㉕甘肃省文物工作队:

《甘肃秦安大地湾901号房址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2期;汪国富:《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奇迹——走进大地湾F901原始宫殿遗址》,《发展》2012年第6期。^②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秦安大地湾901号房址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2期。^③蒲慕州:《追求一己之福:中国古代的信仰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④[美]奥古斯汀·富恩特斯著、贾丙波译:《一切与创造有关——想象力如何创造人类》,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195—196页。^⑤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11页。^⑥周广明、和奇:《人类文化进程中的陶器起源——关于陶器起源的另一种假说》,《南方文物》2016年第1期。^⑦曹兵武:《中国早期陶器与陶器起源》,《中国文物报》,2001年12月7日。^⑧马健鹰:《“汤”“庶”考——兼论水煮法、石烹法的发明历程》,《美食研究》2015年第1期。^⑨刘莉:《早期陶器、煮粥、酿酒与社会复杂化的发展》,《中原文物》2017年第2期。^⑩⑪⑫[加]森舸澜著、陶然译:《我们为什么爱喝酒》,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98页,第6页,引言第12页。^⑬陈淳、郑建明:《稻作起源的考古学探索》,《复旦学报》2005年第5期。^⑭刘莉提出,西坡遗址中发现大量家猪骨骼,大量养猪可能是为了供应礼

仪宴飨。我们不能排除猪肉作为宴饮的美味佳肴比其他肉食更受欢迎的可能性,这种情况可能会刺激人们对猪进行驯化的念头。参见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29、202页。^⑮陈洪波:《中国酿酒起源考古研究综述》,《南方文物》2020年第6期。^⑯[美]M·哈里斯著、李侠祯译:《夸富宴——原始部落的一种生活方式》,《民族译丛》1986年第6期;[美]哈维兰著、秦学圣译:《夸富宴》,《东南文化》1986年第1期。^⑰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第220页。^⑱何努:《浅谈陶器文明的“美食政治”现象》,《中原文化研究》2021年第4期;马健鹰:《〈左传〉中的饮食活动及宴饮诗研究》,《扬州大学烹饪学报》2003年第1期;薛小林:《秦汉时期宴饮活动中的政治秩序与权力运作》,《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1期;陈峰:《宋太祖朝的曲宴及其政治功用》,《历史研究》2018年第4期。^⑲[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著、赵丙祥译:《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09页。^⑳杨德睿:《权力为盛典服务,抑或盛典为权力服务?》,载[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著、赵丙祥译:《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代译序”,第6页。

On the Role of Food and Feasting in the Advancement of Civilization in the Stone Age

Xue Xiaolin and Jiao Jianping

Abstract: In the late Paleolithic period, the widespread emergence of human-made fire sites marked a significant transition as humanity entered a stable stage of consuming cooked food. The sites became the center for early humans. Cooked food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 brain and human physical evolution. The sites also served as a space for communication among humans in the Stone Age, facilitating language capabilities, strengthening group cohesion, and nurturing self-awareness. This marked the first boost in the evolu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In the Neolithic era, most settlements constructed large and elaborate houses serving for tribal public gatherings and religious ceremonies. The development of pottery, winemaking, and cooking techniques, along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se large houses, led to the earliest banquets in history. Tribal leaders utilized these grand buildings to brew wine and host feasts, thereby elevating their status and authority. Unlike military violence, banquets provided a gentler means of competing for authority,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and consistently propelling the evolution of human culture. The change from fire sites to grand houses also represents the impact of food and feast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Key words: fire sites; grand houses; group communication; 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

[责任编辑/小珂]